

国民党 党化教育制度研究

GUOMINDANG DANGHUA JIAOYU ZHIDU YANJIU

(1924—1937)

陈钊 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本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11YJC770006)

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研究 (1924—1937)

陈钊 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研究:1924~1937/陈钊著.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81092-969-1

I. ①国… II. ①陈… III. 国民党党化教育—教育制度—研究—1924~1937 IV. ①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3879 号

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研究:1924~1937

陈 钊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陕西杨凌杨武路 3 号	邮 编:712100
电 话	总编室:029-87093105	发行部:87093302
电子邮箱	press0809@163.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62 千字	

ISBN 978-7-81092-969-1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概念界定	(2)
三、学术史	(6)
四、研究范围	(14)
五、资料概述	(15)
第一章 以党治国与党化教育	(17)
一、从政(治)教(育)合一到“效法俄人”	(17)
二、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定型	(22)
三、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	(29)
第二章 党化教育制度的建立	(35)
一、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党化教育	(36)
二、蔡元培、蒋介石与党化教育	(41)
三、党化教育管理机构的的确立与演变	(46)
第三章 党义教学体系的建立与运作	(54)
一、党义课程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54)
二、党义课之教学及效果	(66)
三、党义课程考试	(75)
四、军事教育中的“党”	(77)
第四章 党义教师管理制度的建立与运作	(81)
一、党义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的建立与运作	(81)
二、党义教师的供求与聘用	(95)
三、党义教师的职业认同	(100)

第五章 校园生活的“党化” (106)

 一、仪式中的“党” (106)

 二、校园生活的“党化” (116)

第六章 组织控制与党化教育 (124)

 一、教育行政机构的“党化” (124)

 二、师生入党 (126)

 三、控制学生团体 (138)

 四、惩戒与党化 (140)

第七章 党化与非党化 (145)

 一、自由主义学人群与国民党党化教育 (145)

 二、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党化教育 (155)

 三、党化与“教”化 (159)

 四、中共对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的冲击 (170)

结 论 (175)

 一、先天不足的党化教育制度 (175)

 二、多元社会中思想独尊的难度 (179)

 三、从党化到“化”党 (183)

征引文献 (186)

后 记 (200)

表格目录

表 1	国立中山大学党义讲演一览表(1927 年 3—6 月)	(39)
表 2	国立中山大学党义讨论会一览表(1927 年)	(40)
表 3	国民党中央党部机构人事变迁表(1928—1937 年)	(45)
表 4	大学党义课程修习情况表(1929—1937 年)	(56)
表 5	长沙市中小学校开设党义课课程名称一览表	(58)
表 6	中央训练部党义课程编订委员会委员职务分配表	(60)
表 7	浙江省初中毕业会考党义成绩表(1932 年春)	(76)
表 8	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成员表(1928 年)	(87)
表 9	大学党义教师资格检定不合格人员情况表(1929 年 5 月)	(89)
表 10	长沙市党义教师供求状况统计表(1928 年底)	(95)
表 11	长沙市训育主任供求状况统计表(1928 年底)	(95)
表 12	浙江大学总理纪念周演讲内容一览表(1936 年 5 月—1937 年 12 月)	(109)
表 13	修正各机关及学校放假日期表(1929 年 5 月)	(113)
表 14	革命纪念日简明表(1929 年 7 月)	(114)
表 15	长沙市中小学校所藏党义图书数量统计表(1928 年)	(118)
表 16	安徽省高中英文、国文、党义论文竞赛分数统计表(1930 年)	(121)
表 17	安徽省初中英文、国文、党义论文竞赛分数统计表(1930 年)	(121)
表 18	全国初等教育行政人员总数暨党员人数表(1931 年)	(125)
表 19	国民党各省党员学生、工人、农人所占百分比一览表(1925 年)	(130)
表 20	国民党江苏省党员职业统计表(1928 年)	(131)
表 21	浙江省中等以上学校党员分布表(1928 年)	(131)
表 22	长沙市中小学校长党籍状况统计表(1928 年)	(134)
表 23	长沙市中小学教职员党籍状况统计表(1928 年)	(134)
表 24	中国公学校董会成员变迁表(1928 年 6 月—1931 年 2 月)	(151)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如果说“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①,那么,1927年4月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党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以党治国之始。与北平政府时期相比,“党化”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的基本特点。国民党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唯一执政党,大力将国民党的势力扩张到教育领域。从教育宗旨、课程标准的制订、课程体系的设计、到教育行政机关、学校管理人员的选拔、教师资格的认定,再到师生校园生活的开展、校园环境、教室的布置,国民党的要求无处不在。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执政的国民党正是通过一整套党化教育制度,传播其意识形态,建立国民对其统治的认同,从而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党化教育制度运作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检验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稳定性的试金石。

党化教育制度既是国民党用以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制度,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正式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直到1949年才与国民党政权一起在大陆覆亡。^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与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努力如影随形。因此,系统研究党化教育制度的建立、演变、运作,有助于把握民国教育的整体面貌。然而,目前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迄今的研究,主要分散在中国教育通史类著作、民国教育断代史、民国政治文化史中,专题研究著作极少,缺乏宏观的把握;从具体运作方面看,多注意国民党“党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自序”,第1页。

^②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痛定思痛,深感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颓势是导致其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因而大力发展党化教育制度。直到2000年政党轮替后,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才逐渐走向解体。民进党执政初期,大专院校仍开设有《国父思想》课程。见李定国:《宪法与立国精神》(PPT),“导论”,Google文档。

化”教育的一面,而对被“党化”的一方、党化教育制度的执行者关注不够。本书以近年来刊布的新材料为基础,力图从整体面貌和具体运作两方面形成对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的新认识。

在民国史研究领域,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都是热门分支,但与政治史、思想史关系密切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史却鲜有问津。^① 在近代中国有着重大影响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究竟以什么管道进行传播,受众的接受情况如何、传播体系与受众的互动情况如何,均不甚了了。究其原因,恐怕与这样的研究比较“虚”有关。政治史、思想史的分析容易落到实处,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虽然看得见,摸得着,但受众是否接受,接受程度如何,限于材料,研究者极少关注。但这样的研究显然极有价值,所谓人心向背,正是这些看起来“虚”的东西。本书分析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发展、演变、运作中,国民党与教育领域的互动及双方借以互动的资源,主要包括:国民党以什么为依据,依靠什么资源、如何“党化”教育;学校师生对“党化”的态度,师生如何对国民党“党化”教育做出回应;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运作的经验教训。本书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尝试,为观察意识形态的传播、接受史提供一个实例。

二、概念界定

从历史自身的变迁中提炼“党化教育”的含义,而不是用后人的理解贯穿全文,可以避免“以后来之观念统系材料”之弊。“党化教育”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教育领域出现的重大现象,从一开始这个词就充满争议,因此有必要在研究展开前就“党化教育”一词的来历及其内涵外延做一番梳理。

迄今所见较早讨论党化教育问题的,是1924年1月23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版及宣传问题”案。叶楚傖在口头报告该案大概时说:

现在本党无中学和大学,将来即有了,也应用党内编定教科书,至少也要三分之一以上。不仅党内的学校如此,还应该将本党编定的教科书扩充于其他学校,则将来其他学校皆变成本党的学校。还有教员介绍也很重要,因为把本党党员介绍入于他校,则本党在该校即有一份潜势力。^②

^①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早有人研究,成果亦多,但基本集中于对传播一方的论述,极少涉及受众一方。新近的研究利用文学作品、日记等材料,开始讨论受众的接收,如李晓宇的《民国知识阶层视野中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4期)、何稼书的《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2-33页。

叶楚伦的这段讲话既提到课程设置,也提到人员渗透,已初具党化教育制度框架。^①

1925年1月,教育部下令免去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职务,引发风潮,挺郭众教授在宣言中说:“传闻此次郭校长免职之举,确为所谓‘党化教育’之一幕”,^②这是比较早的使用“党化教育”这一名词的文章。邵力子也认为“党化教育”这一名词的出现,“实由于东大校长免职问题”。^③东大教授们用的“党化教育”一词是贬义词,所谓“党化”,实指若干国民党人在此次风潮中的政治运作,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传播;所谓“党”,指试图插足教育的某一党派,是政治地位平等的党派之一,而非专指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此时的国民党还远不是全国性的执政党,《民国日报》(上海版)所在地也不在国民党手中,宣传国民党主张还是一件颇有风险的事。因此邵力子同意:“……各政党都可派领袖到大学里去充分的宣传党见政策,使大学员生领受之后,用科学研究的态度,根据政治的原理,作公平的评判与合理的取舍。如果有一政党的党见政策,果然最好,有益民众,大利国家,(如今中国国民党的党纲),那些大学员生,一定代该政党竭力宣传。……”^④主张各政党一律平等正是列宁式政党与当政者竞争话语权的基本战术,一旦大权在握,除国民党外,随便进入学校宣传的其他政党便成为“反革命”。

张奚若《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一文,较周详地解说了“党化教育”中“党”的含义。他认为“党化教育的‘党’字,原不必定作政党解。政党而外,还可解作教党或朋党。所谓教党就是对于国家教育政策或教育方针意见不同的教育派别。……朋党乃以利害关系相结合的私党。”^⑤恽代英亦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党化教育”的“党”,不一定专指国民党,也可以是如郭秉文、黄炎培这些“没有远大目的的私

① 吕芳上认为,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平民教育委会1925年10月草拟的平民教育方针“为实施本党政纲,励行教育普及起见,特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办理平民教育,先作初步的识字运动,进而灌输普通常识,启发革命思想,使全国民众能一致切实从事革命工作”,是国民党“党化教育”、“党义教育”的发端。(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278-279页。)实际上,国民党正式讨论党化教育问题比这个文件还要早。

② 较早注意到这个缘起的是舒新城,见其《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62-263页。罗能康则认为中国的党化教育始自秦皇汉武,见其《我国最早之党化教育》,《东南论衡》第1卷第20期,南京,1926年10月30日,第8-11页。

③ 邵力子:《论党化大学》,《民国日报》(上海版)1925年2月12日,第1张第2版,《民国日报》(上海版)第55分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第440页。

④ 邵力子:《论党化大学》,《民国日报》(上海版)1925年2月12日,第1张第2版,《民国日报》(上海版)第55分册,第440页。之前,邵力子还在《民国日报》(上海版)发表文章,主张“学术自由”。见邵力子:《宜一致拥护学术自由》,《民国日报》(上海版),1925年2月7日,第1张第2版,《民国日报》(上海版)第55分册,第386页。

⑤ 张奚若:《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现代评论》第1卷第17期,1925年4月4日,第7页。

党”。^①

较早全面论述“党化教育”问题的是陈绍贤^②。1926年3月,陈绍贤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长文,提出“党化教育”“就是以中国国民党的党纲和策略,为教育行政的标准,养成信仰和实行孙文主义的信徒,以增加国民革命的实力,巩固国民革命的战线”。^③陈并开列出“党化教育”下教职员必备的几个条件:

- 一、国民党员,并且是孙文主义的信徒。
- 二、人格高尚,学识丰富,毅力坚强,感情和蔼。
- 三、能以孙文主义训练学生。
- 四、能够领导学生参加国民革命。
- 五、能够造成充满革命精神的学风。
- 六、平民化的生活色彩。^④

国民党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运用“党化”二字论述教育政策,出现在陈公博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运动报告》中,在这篇报告中,陈提出今后的工作计划:

1. 注意各学校之党的运动;
2. 设法统一青年运动;
3. 设法收回教会学校之教育权;
4. 编制合于党义之教科书;
5. 对于学校取党化主义。^⑤

1926年1月,广东省省党部青年部在其“一年来工作报告”中,提到青年部内部分工,共十七项工作,第十七项即是“党化教育及党团”,^⑥负责人之一即是广东省党部青年部部长。这是在国民党正式文件中比较早地出现“党化教育”四个字。

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韦恂在《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中说:

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

① 但一:《一种机会主义——党化教育运动》,《中国青年》1925年第87期,第546页。

② 广州学生联合会文书股有陈绍贤,不知是否与《教育之党化问题和中等教育之实行党化》作者为同一人?见《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常会纪录》,载广州学生联合会编印:《广州学生》(旬刊)第1期,1926年11月1日,收入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编印:《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1989年,第540页。

③ 陈绍贤:《教育之党化问题和中等教育之实行党化》,《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31日(肆),《广州民国日报》第13分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第316页。

④ 陈绍贤:《教育之党化问题和中等教育之实行党化》(四),《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3日(肆),《广州民国日报》第14分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第28页。

⑤ 陈公博:《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运动报告》,1926年1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编印:《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辑,1989年,第7页。

⑥ 《广东省省党部青年部一年来工作报告》,1926年1月,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编印:《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辑,1989年,第55页。

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议决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几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①这是国民政府官方首次全面阐述“党化教育”一词的含义。^②

国民党人使用“党化教育”一词时,有时也用来指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全部教育活动,^③如下列数例:

1. 全省教育大会

党化教育的含义:“关于教育宗旨,应注重平民化与革命化之教育。”出处:《全省教育大会党化教育决议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0日(版次不清),《广州民国日报》第15分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第35页。

2. 王克仁

党化教育的含义:“革命化,人格化,民众化,社会化,科学化。”出处:《党化教育概论》,第2-10页。

3. 陈公博

党化教育的含义:“实施革命教育之方针;实现平民化的教育。”出处:《教育行政委员会昨日就职》,《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日(三),《广州民国日报》第13分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第9页。

“党化教育”的批评者则多关注“党化教育”的“党化”方面。1932年,任鸿隽在批评党化教育的名篇《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中,给“党化教育”下定义:

(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

(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④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第9页,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2编第46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有著作将之与许崇清的《教育方针草案》混淆。

② 自从舒新城将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教育厅长许崇清的《教育方针草案》编入《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2编第46册《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即“党化教育史料”专辑后,研究者多认为“党化教育”方针的提出始自许氏。查《教育方针草案》全文,并无“党化教育”四字,连“党化”的字眼也没有。之所以有此失手,可能是因为引用者未核对《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所载《教育方针草案》的原始出处《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中华基督教教育会1926年10月出版,舒先生将其错植为1926年8月),将舒新城为《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即“党化教育史料”专辑第一部分起的标题“党化教育之方针”,当作许崇清原文的标题。

③ 这种现象,吕芳上称之为:“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概念‘有渐渐膨胀的趋势’”,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322页。但在实际操作中,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全体教职工入党,全校闹革命,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禁止以职业为标准划分区分部,“化”的对象是在减少中。而且,广州革命政府时期学校与革命机构不分,最典型的便是中山大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治学校承担了中山大学的“革命”职能,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大中小学不再是革命机构,而成为教育机构。

④ 任鸿隽:《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独立评论》第3号,北平,1932年6月,第13页。

国家主义派的邱椿对“党化教育”的概括与任鸿隽相差无几,他认为党化教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比较和平的,即:

一个执政的政党,用法令的方式,制定教育方针,改变学校课程以贯彻其政治上的主张,或用浮夸的言辞及不正当的方法,对思想未成熟的青年,宣传其片面的主义,而同时又不容许他党在学校里做宣传的工作。

除此之外,

又在教育机关及学校内,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使教育界都要入党,不入党便不能在教育界服务,甚至利诱及威迫未成熟的学生入党!这是空前的激烈的党化教育。^①

从上述梳理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党化教育”的批评者,在界定“党化教育”概念时都强调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两方面对教育的控制,这是“党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本文使用的“党化教育”概念,意指国民党势力伸入学校、控制教育的一种行为。^②所谓党化教育制度,即国民党在教育领域通过传播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国民党组织,建立、强化师生对其统治认同的制度,^③包括党化教育组织机构,党化课程教学体系,党化课程任课教师资格认定制度,校园生活的党化,对教育行政机关、学校教职员、学生的组织控制制度等几个方面。

三、学术史

在党化教育制度还未建立之前,讨论党化教育的文字已相当多,以今日学术的

① 邱椿:《反对党化教育的理由》,《醒狮周报》第148期,1927年9月10日,第6页,陈正茂编:《中国青年党史料丛刊》第1辑《〈醒狮周报〉(三)》,台北:“国史馆”,1993年。

② 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宣布改“党化教育”为“三民主义教育”。然而,“党化教育”一词仍在大量使用,1931年4月,新生命书局总编辑樊仲云在《社会与教育》发表《党化教育论》(社会与教育社编:《社会与教育》第23期,上海,1931年4月18日,第154页);任鸿隽在1932年发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再论党化教育——答范云龙先生》(《独立评论》第8号,北平,1932年7月10日,第10-13页。),故本文以“党化教育”一词统称1928年前的“党化教育”与1928年后的“三民主义教育”。

③ 本文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服务于权力的意义,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意义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见[英]约翰·B·汤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7页、第62页。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沈宗美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2页。)李国钧、王炳照认为,“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在其规范性方面,无论是法制性教育制度,还是惯例性教育制度,都具有比较浓厚的强制色彩。这种强制,通常是由制度制定机构的权威性(如国家),或制度在持久的形成、维系过程中凝固的权威性予以实施的。”(于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民国时期)“总序”,第8-9页。)制度的特点,一是相对稳定,一是具有强制性。党化教育制度既不是单纯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是兼具政治、教育二重属性。这里之所以不用“政治教育”一词,是因为这个词的指谓显得狭窄,容易让人误解为课程教学。

标准衡量,这些文字多为对党化教育政策的阐释,难以称得上是研究著作,不在本目讨论范围之内。1928年党化教育制度建立后,相关的论述、研究持续不断,积累的资料、论著颇为可观,可以说但凡论及民国教育者,几乎没有不提党化教育的,本文不可能也无必要一一罗列,只就其要者,以时间为线索,作简要评述,借以展示学术自身发展之脉络、前人之贡献和本文尚可立足之空间。^①

1949年前的研究状况

几乎在党化教育制度发端时,相关资料的整理、研究已展开。中央图书局编辑出版的《党化教育辑要》可视为最早的“党化教育”资料汇编,该书分“理论”、“法规及计划”两编,收入孙中山的《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等26篇文献。^②从该书的篇目看,“党化教育”的范围相当广泛,大致相当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部教育。舒新城编辑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专载党化教育史料,成为日后研究“党化教育”者的必备参考书。^③

1949年前论述“党化教育”的著作,较早者是徐蔚南的《党化教育》,该书是“党治下之新国民丛书”之一,分“党化教育的起源”、“反党化教育的评论”、“党化教育的拥护”、“教育研究者目中的党化教育”、“党化教育的实施方法”五个部分介绍“党化教育”。^④该书主要功用在于普及时兴知识,但保存了若干有价值的史料。王克仁著、初版于1927年8月的《党化教育概论》,封面印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审定”字样。该书论述了“党化教育的意义”、“党化教育的重要目标”、“实施党化教育的原则和方略”,更像政策说明书,而非专门研究著作。该书出版后约一年半,王即代理中央训练部党义教育科主任。^⑤江卓群的《党义教育ABC》论述了“党义教育的实施”、“党义教育的教学法”、“党义教育的学校行政”,作者的目的,在于“专供今后中小学实施党义教育的人手办法”。^⑥该书所用“党义教育”一词,范围与王克仁所用“党化教育”大致相同。

舒新城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专辟一章,从“党化教育”概念的产生、思想

① 之所以以时间为线索,主要是考虑到这样做便于看到学术自身发展的脉络,而按作者设定的研究框架将以往的研究分成几大块,不免有观念先行之嫌。

② 中央图书局编印:《党化教育辑要》,1927年,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③ 该补编收入《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初版,1933年再版。见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2编第46册《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上海:上海书店,该书据中华书局1933年版《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影印而成。

④ 徐蔚南:《党化教育》,上海:世界书局,1927年6月初版,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⑤ 王克仁:《党化教育概论》,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8月初版,1928年7月再版,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王的职务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⑥ 江卓群的《党义教育ABC》,上海:ABC丛书社,1929年,并见“例言”,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的变迁、影响等方面论述“党化教育思想”。舒新城认为“党化教育”这一名词是“根据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口号而来”，在1925年东南大学易长风潮后成为一流行名词。有鉴于该名词含义的模糊，舒氏尽其所能列举了不同身份人士对“党化教育”的定义，为后来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线索。^①无论是相关史料的搜集，还是对史料的分析，《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都是1949年前研究“党化教育”一座高峰。此外，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亦论及“党化教育”。^②朱子爽编著的《中国国民党教育政策》集作者的论述和资料汇编于一身，较为全面地考察国民党教育政策，但作者的重点不在“党化教育”。^③

总体来看，1949年前的“党化教育”论述，主要从政策、思想层面着手，多数集中于教育学领域，作者们的倾向在于论述“党化教育”该“如何做”，少有论及“为什么”，从学术的角度反思“党化教育”者为数甚少，更鲜有人探讨“怎么样”，对“党化教育”政策的执行情况几乎没有涉及。

1949—1989 年间的研究状况

1949年后的“党化教育”研究，与整个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亦步亦趋。首先取得突破的是海外的学者。John Israel（易社强）的 *Students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论述了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与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民党与学生的关系虽然日渐疏离，但“直到1937年，整个民族——包括青年，似乎都还全心全意支持中央政府”。^④

香港中文大学李杰泉完成于1987年的硕士论文《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党化教育：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是笔者所见最早专门研究“党化教育”的著作。该文以国民党要求思想一统为线索，分“增设党义科”、“加强检定教科书”、“非形式教育”、“中小学会考”、“特种教育”、“审查教师思想”、“设立‘教训合一’制”、“推行‘学校军事化’”、“在野学派的指责”、“国民党的检讨与遗恨”等方面，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了“党化教育”这一民国教育史、政治史上的重大现象。^⑤限于当时的资料查阅条件，该文几乎没有利用国民党的官方报纸，诸如《广州民国日报》、《民国日报》（上海版）、《中央日报》，和该时期的大量期刊，如《中央党务周刊》、《中央周报》、《社会与教育》，因而无法描摹党化教育制度运行的实态，无法重建三民主义从思想到制度到观念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该文认为，“当时各在野党派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该书最早由中华书局于1929年出版。

②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

③ 朱子爽编著：《中国国民党教育政策》，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年。

④ John Israel: *Students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84.

⑤ 李杰泉：《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党化教育：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硕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牟路思怡图书馆藏。

对党化教育的抨击,似以自由主义者最中核心”,^①而对中共、基督教与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关系则付之阙如。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是80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著作,第5卷论述“党化教育”,认为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党化教育”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因而“具有革命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党化教育”则只是“服务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党专政”。^②符合“三大政策”,党化教育便“具有革命性”,不符合则是“服务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党专政”。脱去上述结论的时代外衣,可以看出作者已注意到党化教育与国民党权力消长的关系。

这一时期以李杰泉的硕士学位论文为代表,可称之为重新出发阶段。

9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

初版于1990年的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是研究民国政治与学术关系的重要作品,该书专辟一章讨论党治下的高等教育。Wen hsin Yeh(叶文心)指出,国民党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不仅实现了“党化”,也促进了学校教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叶书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党化”不仅体现在对学校人事的控制、设置党义课程等方面,还体现在对学科分布、学科发展的影响方面。她发现国立中山大学对党化教育的热情伴随着对自然科学、农学、医学的强调,因为这些学科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从而“巩固而不是威胁现有社会政治秩序”。^③

黄坚立的《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以“去政治化”概念解释国民党学运政策、政治教育的目的。^④这个概念很有冲击力,与之前John Israel等人以民族主义为线索的研究大异其趣。该书写作时,今日研究者习见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等大型史料书尚未出版,但作者仍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档案史料,精彩分析了国民党以政治手段“去政治化”的两难。

台湾陈能治的《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⑤、陈进金的《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

① 李杰泉:《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党化教育: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第255页。

②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第248页、第251页。

③ Wen 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Council of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pp. 167—182.

④ 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该书英文版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初版于1996年(New York: P. Lang)。

⑤ 陈能治:《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

究(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六年)》^①均注意到国民党训练部系统在党化教育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党化教育”实施过程中教育行政机关和训练部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还征引丰富的第一手史料,论述了大学党义教育政策的实施状况,并以此推断“党化教育”的效果,是很有价值的探索。二陈著作是迄今论及“党化教育”的著作中,研究最为细致、扎实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不仅是研究学生运动的重要著作,还依据大量档案史料研究了“党化教育”的缘起、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初步实施,成为以后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②

中国内地方面,随着90年代以来民国史研究的崛起,民国教育史研究风生水起,“党化教育”方面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均取得了较大突破。

首先,民国教育史料整理出版方兴未艾,一批与“党化教育”有关的重要史料陆续出版。1994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设“党化教育”专题,分“教育原则与方案”、“学校训育”、“党义教育”、“公民教育”、“党义课程审查与出版”五个子目,收入与党化教育有关的档案33条。^③这个专题不仅提供了研究党化教育的第一手档案史料,其编排方法也足堪师法:不仅条列一般规定,还附上具体案例。从这个角度讲,90年代的中国内地研究大致还没有超越这册史料书的水平。总数达208册的《民国教育公报汇编》收集了大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公报,使史料采样的平衡成为可能。^④

其次,一批民国教育通史率先对“党化教育”开展研究。1990年初版的《中华民国教育史》是1949年后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部民国教育通史类著作。该书叙述了“党化教育”政策的制订、实施,国民党“对学生采取的控制措施”,比较全面地提到实施党化教育政策的方方面面。但本书主要依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而成,材料单一,只列举政策文本,不涉及制度运作。^⑤申晓云主编的《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以15页的篇幅论述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政策的制定和贯彻”;^⑥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研究了蒋介石的党化教育思想,客观地评价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但限于体例,基本没有涉及“党化教育”如何实

① 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笔者与陈先生素昧平生,仅以一封电邮便索得大作,谨此致谢。

②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10-1123页。

④ 段梦霞、李强选编:《民国教育公报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⑤ 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⑥ 申晓云主编:《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施,实施的效果如何?^①该书意在跳出教育史研究教育史,故一出版即引来好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7卷注意到,不同时期三民主义教育的内容并不相同。^②

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民国时期)专列一章,研究“三民主义教育制度”,但此处的“三民主义教育制度”研究的是国民政府的整个教育制度,与本书的关注点不同。^③

再次,出现“党化教育”专题研究著作。华南师范大学袁征的 The ‘Participation’ of Education: A Pivotal Turning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1924—1929 是较早一篇“党化教育”专题研究论文。该文认为,“党化教育”是近代中国教育的转折点。^④两年后袁又考察了蔡元培从教育独立到党化教育的心路历程,发现了蔡元培的另一侧面。^⑤张太原的《孙中山与党化教育》论述了孙中山与“党化教育”的缘起,仔细辨析了“党化教育”含义的演变,言前人所未言。^⑥熊秋良的《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指出,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政治动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⑦熊文还认为“党化教育”受到苏俄的影响,但细读该文便可发现,此处讲的影响,是范围更大的“以党治国”,还没有落实到更具体些的“党化”或是“宣传”。徐希军的《1928—1937: 国民党推行党义教育述评》,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诠释国民党大学“党义教育”,第一次提出“党义教育制度化”概念,^⑧但总体而言,该文在史料、史论上均未能超越前人。

王彤宇的《1927—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研究——以教育领域为中心》,是中国内地迄今唯一一篇专门研究 1927—1937 年间党化教育的学位论文,但受篇幅和材料所限,基本是对“党化教育”相关条文的描述,而且未提国民党训练部系统在“党化教育”中的推手作用,反倒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化教育”的党方执行机构。^⑨闵强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大后方国民政府“党化教育”述

①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② 王炳华、董宝良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7卷(1927—1949),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页。本条史料所在的第1章由熊贤君执笔。

③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于述胜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④ The ‘Participation’ of Education: A Pivotal Turning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1924—1929,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vol. 25, no. 2 (April 2000), pp. 33—53, 本文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恒俊博士复印,谨此致谢。

⑤ 袁征:《从教育独立到党化教育: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变化》,《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24期,2002年冬季。

⑥ 张太原:《孙中山与党化教育》,《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⑦ 熊秋良:《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⑧ 徐希军:《1928—1937: 国民党推行党义教育述评》,《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⑨ 王彤宇:《1927—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研究——以教育领域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6年,中国知网。